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方东美文集

方东美 著

山
高
水
長
流
風
是
美

根
深
葉
茂
實
亦
聲
滋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014005325

B0-53
16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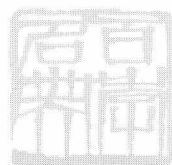
方东美文集

方东美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B0-53/16



北航

C16925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东美文集/方东美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1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2014-3

I. 方… II. 方…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6333 号

责任编辑:胡国民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2 字数: 599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014-3 定价: 9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宁津生	石 兢	刘经南
何克清	吴庆鸣	李文鑫	李平湘
李晓红	李德仁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易 帆	谈广鸣	舒红兵	蒋昌忠
樊明文			

秘书长 李平湘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韩 进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费成	方 卿	邓大松	冯天瑜
石义彬	余双好	汪信砚	沈壮海
肖永平	陈 伟	陈庆辉	周茂荣
於可训	罗国祥	胡德坤	骆郁廷
涂昱峰	郭齐勇	黄 进	谢红星
韩 进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东美，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17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21年毕业后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学深造。1924年回国后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前身）。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政校及中央大学哲学教授。1948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教授。方东美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精研哲学，成就卓著，被誉为“一代大哲”。主要著作有：《科学哲学与人生》、《中国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生生之德》、《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国大乘佛学》、《坚白精舍诗集》等。

方东美基于“普遍生命”的观念建构其生命哲学的理论系统。这种哲学系统，既能够沿袭融会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三家之学中有关生命哲学的思想资源，又能够借鉴吸纳西方柏格森、怀特海哲学中的思想精粹，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路径与理论追求。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出版说明

本书以方东美先生《生生之德》一书中所收入的十篇文献为主体，再兼收方先生有关西方哲学、儒家、道家、佛学等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十篇，以二十篇的篇幅构成全书的基本内容。

作为"一代大哲"，方先生学贯中西，谈古论今，博纳百家之长，遂成其生命哲学之主旨。鉴于此，本书尽量保存了原作品的风貌。但书中不可避免地遣词、造句、行文方面，与现代普通话语法规范及现代人阅读习惯不符。由于这些行文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仍尊重原文，并未擅加改动，而是任其自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11月

编者前言

田文军

武汉大学伴随着近现代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沐风栉雨，已经走过120年的光辉历程。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走进武汉大学，为国家民族的强盛，追求新知，砥砺心智；一批又一批学术精英来到武汉大学，为国家民族的强盛，传道解惑，精心育人。方东美先生即是武汉大学名师群体中的卓然大家。为了纪念方东美先生为武汉大学曾经作出的贡献，展示方东美先生的学术智慧，我们在武汉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选编了这部《方东美文集》。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字东美，安徽桐城人，出生在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望族家庭。1917年，方东美先生毕业于桐城中学，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专攻哲学，曾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会”会长。1921年，方东美先生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1924年，方东美先生以《英美新唯实论之比较》为题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归国。回到祖国以后，经过激烈竞争和严格考核获聘担任武汉大学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大学教职，讲授哲学课程。任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方东美先生其后数十年教学生涯的开始。后来方东美先生曾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等学校。1947年，方东美先生迁居台湾地区，并长期执教于台湾大学哲学系，担任过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方东美先生亦曾在台湾辅仁大学担任教职，并曾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等高校担任讲座教授。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方东美先生为了培养现代中国的哲学人才，倾注了满腔热情，耗费了毕生心力，贡献了自己的学识才智。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与创获中，取得过重要学术成就的唐君毅、刘述先、成中英等

著名学者，即分别是方东美先生执教中央大学哲学系和台湾大学哲学系时期的学生，在学业方面受到过方东美先生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

方东美先生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不仅培养出了众多哲学人才，在学术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方克立教授与李锦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确立了11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取得过重要学术成就的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方东美先生即是研究对象之一。余者为：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如果从纯哲学的角度审视这11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在理论的建构方面最为系统及圆融者当推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五位学者。这五位学者的学术道路、人生际遇、致思趣向、学术成就又各有其别。冯友兰晚年有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本书在论及中国现代哲学时，曾将“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与“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定位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将“熊十力哲学体系”定位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耄耋之年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不曾论析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学系统。实际上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学大体上也可归于熊十力一系的“心学”。熊十力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唐君毅则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才转学至中央大学哲学系，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牟宗三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因此，唐君毅、牟宗三的学术活动都曾受到熊十力的影响。唐君毅、牟宗三也自认为熊十力后学。

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学理论，就其思想资源而言，除了中国的佛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也涵括西方的柏格森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及怀特海哲学。对于熊十力一系的现代“心学”，贺麟在其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当代中国哲学》^①中，曾有过精彩的解析与评断。贺麟认为，在“本体”论方面，熊十力“冥心独

^① 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造，直探究宇宙万有的本体”，强调“本体”的“无形相”、“无滞碍”、“绝对”、“永恒”、“全”、“清净”、“刚健”等多方面的特征，肯定“本体”实即人的“本心”，人的“本心”实即是“仁”。这样的本体学说，既充分地代表了儒家的传统，又能够以“本心为绝对待，遍为万物实体，不仅主乎吾身，而遍为万物之主”^①。同时，熊十力吸纳王阳明“即知即行”的观念，主张“体用不二”，肯定“无体即无用，离用原无体”。在“功夫”论方面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理论创获。在论及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时，贺麟特别欣赏唐君毅有关道德自我方面的思想观念。他认为唐君毅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中“指出心之本体之存在及其真实至善即是道德自我的根源，且说明心之本体即现实世界之本体。最后，讨论精神或心之本体之表现于生活文化的各方面，以明人性之善及一切生活皆可含有神圣之意义”^②。这样的思想是一种最具特色的“理想主义道德思想”。对于牟宗三哲学，贺麟则欣赏其致思路径。他认为牟宗三的哲学“趋向唯心论，然而总想与新实在论相调和。一面注重康德的理性批导，一面又想辅之以怀特海的宇宙论，使康德更走向客观化”^③。在贺麟看来，这样的思想路径是有利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贺麟当年对于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哲学的哲学评析，以他自己对于“心学”价值的理解为前提。其时，贺麟有《近代唯心论简释》问世。在《近代唯心论简释》中，贺麟将唯心论理解为“唯性论”，肯定这种哲学实为一种精神哲学；并认为在这种哲学系统中，心只是逻辑意义的心。这样的心乃是一种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这样的心既可统摄经验，主宰行为，也可组织知识，评判价值。人们对于人生的理解和人生价值的发现，都出于此心。因此，唯有这样的哲学，才可能在道德方面真正论释“尽性”，实现“自我”。唐君毅、牟宗三的哲学理论后来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贺麟当年还不可能阅读唐君毅、

①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②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③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牟宗三后来写成的大量哲学著述。但贺麟在西方哲学方面造诣很高，作为哲学家，贺麟本人对“心学”也持肯定态度。因此，贺麟当年对于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哲学的解析评断，仍可说是准确地理解并揭示了熊十力一系“心学”的理论特色与致思趣向。

冯友兰、金岳霖作为现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与致思途径，与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心学”代表人物有所不同。冯友兰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翌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金岳霖更早，自1914年即开始留美，曾先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1年即已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冯友兰与金岳霖在哲学方面的相通之点在于二人都致力于辨析事物的共殊关系，并建立了各自的形上学系统。所不同者，冯友兰是通过“理”、“气”、“有”、“无”、“真际”、“实际”、“大全”等范畴的规定与辨析，来论释事物的共殊关系，建构其形上学系统。在冯友兰哲学中，除了接受英、美现代新实在论哲学的思想观念之外，强调其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程朱理学的承继与拓展。即所谓“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不是“照着”程朱理学讲。贺麟曾指出，冯友兰哲学的特色在于“他尽力追溯他的学说如何系‘接着’而不是‘照着’程、朱、道家、魏晋玄学及禅宗，发挥推进而来，有集中国哲学大成的地方”^①。这种评断合于冯友兰哲学的实际。金岳霖的思想系统很难归于现代新儒学。但是，金岳霖建构自己的形上学并非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全无关系。金岳霖是通过论“道”来辨析事物共殊关系的。金岳霖论“道”，最基本的命题是“道是式—能”。金岳霖所谓的“道”既是宇宙，也是人们对于宇宙的理解。金岳霖所谓“式”、“能”大体上类似于冯友兰所说的“理”与“气”。金岳霖认为，作为“道”之全体的宇宙，或说作为宇宙的“道”，实际上是一个由“能”与“可能”到现实的演化，这种演化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实底个体化”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区别了“能”与“可能”。金岳霖正

^① 贺麟：《五十年来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是通过对“可能”的辨析，表达了自己对于共相的理解。在金岳霖看来，“共相虽是可能，可能可不一定是共相，可能虽可以有能，而不必有能”^①。或者说“共相是个体化的可能，殊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底各个体”^②。因此“实的共相”不同于“空的概念”。这种理解使金岳霖明确地肯定了共相的实在与具体。他说：“共相当然是实在的。相对于任何同一时间，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现实的，一是未现实的。未现实的可能没有具体的，个体的表现，它根本不是共相；因为所谓‘共’就是一部分个体之所共有，未现实的可能，不能具体化，不能个体化，本身既未与个体相对待，所以也无所谓共。”^③冯友兰曾经认为，金岳霖以分析的方法为“具体的共相保留了一个相应的地位”，对金岳霖的共相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方东美先生的哲学思想既不同于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一类学者的新“心学”，也有别于冯友兰、金岳霖一类学者的新“理学”，而是在宏阔的哲学视阈中建构起来的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自成系统，别具一格。相较于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哲学理论，方东美先生的“生命哲学”之所以自成一家，这与方东美先生接受教育的背景、治学途径及其理论趣向是关联在一起的。方东美先生接受大学教育的金陵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大学。其办学体制多仿照美国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中虽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之类，但以传介西方科学文化为主。这使得方东美先生大学阶段的学习，有条件专注于西方哲学的学习与训练。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方东美先生已经开始在《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与译作。他的《柏格森生之哲学》、《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詹姆士底宗教哲学》等即是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他出版自己的译著《实验主义》，也是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由此可见方东美先生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学习趣向，也

①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页。

②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页。

③ 金岳霖：《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页。

可见方东美先生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学习收获。进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以后，方东美先生在以柏格森哲学为研究对象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后曾赴俄亥俄州大学专研黑格尔哲学，后来又回到威斯康星大学以英美新实在论哲学为研究对象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从方东美先生大学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经历来看，他学习的着力点都在西方哲学。这种学习，使得方东美先生在西方哲学的学养与训练方面具备了非常厚实的基础。加之方东美先生所属的家族本为桐城著姓，素来重视儒家传统文化教育，不少人在传统学术文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明末清初重要的哲学家方以智即是代表人物之一。家庭的教育与影响，为方东美先生培植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方东美先生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也曾潜心研究佛学。这样的学习背景与知识结构，使得方东美先生后来得以自由地遨游在中、西、印哲学的天地之间，终于在极其恢宏的哲学视野中建构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

方东美先生的“生命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植根于方东美先生对于哲学及其现实功能的思考与理解。在方东美先生看来，哲学不同于科学。科学的探析，偏于事物的具体理则，其功能体现在“执简理以御繁事”，而对于“创生的宇宙，活跃的人生”，科学往往存而不论。但人的生活是多面向的。除了对事理的追求，尚向往对情理的理解。因为，情理的世界，是人的生活中“最珍贵的宝物”。而人对于情理的要求与向往，正是哲学得以形成的现实的思想动因。这样的动因，使得哲学的形成不限于对事理的探析，而是源自于“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哲学思想，自理论看，起于境的认识，自实践看，起于情的蕴发。我们如把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点化了，成为一种高洁的意境，自能产生一种珍贵的哲学。”^① 方东美先生强调哲学的产生，既需要“境的认识”，又需要“情的蕴发”，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仅限于“境的认识”，还难以与科学完全区隔开来。方东美先生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这种观点：“哲学

^①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2页。

思想起于境的认识，此中要义是：我们依据某种兴趣，选定某种观点，察觉一群事象的伦脊与线索，以明其理。科学上种种简约律例都不外乎境中事理之写实与说明。境的认识贵在举物得实，抚事求真，常把不关切的要素都置之度外，存而不论。简言之，境的认识只求于时间上空间上种种事理得着一个冷静的系统的了解而已。假使哲学思想仅以此处为止境，所谓哲学纯是科学的化身。”^① 因此，哲学的活动，必须基于“境的认识”，意识到“境”中、“境”外有“情”，识得“情蕴”，才有可能真正地进入哲学的意境。在哲学的意境之中，人们在思考宇宙人生的创生与演进时，才能既探寻其事理的脉络，又咀嚼其无穷的价值意味。这样的“情的蕴发”，作为哲学的活动，实际上是人们美化、善化与价值化宇宙人生的态度与活动。方东美先生曾经说过：“哲学须是尽人之性，使世间有情众生各本其敬生、达生、乐生的懿德，推而广之，创而进之，增而益之，‘体万物而与天下共亲，’以兼其爱；‘裁万类而与天下共睹，’以彰其善；感万有而与天下共赏，以审其美。”^② 而且在方东美先生看来，只有通过“境的认识”与“情的蕴发”相结合建构起来的哲学系统，才可能具备这样的功能，帮助人们穷求宇宙的意蕴，充实人生的内容，理解人性活跃、创造的特质，将现实的世界升华到价值的世界，显示人生的高贵与情趣。哲学也只有在帮助人类完成其生活中对于美与善的追求的同时，才会确立自身的“志业”与价值。应当说，方东美先生对于哲学的这种理解，本身即构成了其“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方东美先生建构其“生命哲学”，经历过一个思想的发展过程。从整体来看，构成方东美先生“生命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他所理解的“普遍生命”。在方东美先生看来，“宇宙不是沉滞的物质，人

①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3页。

②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4~945页。

生亦非惑乱的勾当。宇宙与人生都是创进的历程，同有拓展的‘生命’”^①。而“普遍生命”即是宇宙万有的形上本体与一切生命的活水源头。方东美先生曾具体论释他所理解的“普遍生命”：“生命包容一切万类，并与大道交感相通、生命透过变通化裁而得完成，若‘原其始’，则知其根植于无穷的动能源头，进而发展为无穷的创进历程，若‘要其终’，则知在止于至善。从‘体’来看，生命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大化本体，弥满于空间，其创造力刚劲无比，足以突破任何空间限制；若从‘用’来看，则其大用在时间之流中，更是驰骤拓展，运转无穷，它在奔进中是动态的，刚性的，在本体则是静态的，柔性的。”这种体用不二、刚柔一体，作为宇宙本体、生命动力的“普遍生命”，其基本属性即是“生生”或曰“创进”。方东美先生曾以“育种成性”、“开物成务”、“创进不息”、“变化通几”、“绵延不朽”来具体论述“普遍生命”的特质与功能，并将这些特质与功能谓之“普遍生命”的“五种要义”。在方东美先生看来，正是因为作为宇宙、生命本体的“普遍生命”所具备的“生生之德”，才使得宇宙万物与一切生命的流行大化“驰骤拓展，运转无穷”。

方东美先生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执著与赞美，即是以他的“生命哲学”中这种“普遍生命”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在《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人生》一文中，方东美先生曾经将“典型的中国本体论”视为一种“超级形上学”，认为这种“典型的中国本体论”，“一方面深植根基于现实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摒斥了单纯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从此派形上学之眼光看来，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其中以种种互相密切关联之基本事素为基础，再据以缔造种种复杂缤纷之上层结构，由卑至高，直到盖顶石之落定为止。据一切现实经验界之事实为起点，

^①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8~969页。

吾人得以拾级而攀，层层上跻，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同时，再据观照所得的理趣，居高临下，‘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使吾人遂得凭借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释宇宙存在之神奇奥妙；与人类生活之伟大成就，而曲尽其妙”^①。在方东美先生看来，这种“典型的中国本体论”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达至“无上理境之极诣”，在功用上详释宇宙存在的“神奇奥妙”与人类生活的“伟大成就”，根源即在于这种哲学建构了“一套内在形态的形上学”，能够“将究极本体析而观之”。方东美先生所谓“究极本体”实即他所肯定的“普遍生命”。

方东美先生对于人生价值的追寻与论释，也以其“普遍生命”的观念为基础。在方东美先生看来，宇宙间万有的存在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宇宙间没有一物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原因即在于“一切万物都参与在普遍生命之流中，与大化流行一体并进，所以能够在继善成性、创造不息之中绵延长存、共同不朽”^②。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方东美先生认为，生命的“大化流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即是提升生命的过程。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物质世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等不同阅历，即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地位、生命成就与生命价值。当一个人的生命获取最高的价值或实现最高价值的时候，他的精神成就也能够达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在那一个地方，他不是人的这一点，人的那一点，更不是人的小数点，那是个真正的大人，而这个大人，他整个的生命可以包容全世界，可以统摄全世界，也可以左右、支配全世界。”^③ 当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包容”、“统摄”、“左右”、“支配”全世界时，或者说，通过生命的向上提升，一个人生命的影响能够

① 方东美：《生生之德》，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3页。

② 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5页。

③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4页。

“贯穿到宇宙各方面每一个领域”的时候，“他不是拿这个自然人的资格从事生活，而是拿神圣的品德从事生命活动”^①。这个人实际上达到了一种最高的生命境界，成了“宗教的人”。因为他将寻常的世界变成了神圣的世界，成就了自己尽善尽美的人格。方东美先生赞赏生命的提升，也肯定生命需要“下贯”。认为“下贯”才能使生命的理想与现实“统会”，在现实生活中使人性与神性合一。但他认为，在生命的“大化流行”中，只有生命的不断提升，才能激励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无限追求，由价值不朽体现生命不朽。方东美先生曾说：“任何生命的冲动，都无挫败的危险，任何生命的希望，都有满足的可能，任何生命的理想，更有实现的必要。”^② 因为，宇宙“根本就是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生命的“冲动”、“希望”、“理想”或者生命的提升，都符合宇宙生生不已、新新相续的特质。方东美先生也承认，一个在自己的人生中，很难成为儒家所推崇的“圣人”，道家所推崇的“至人”或佛家所推崇的“般若与菩提相应的人”。但人们还是应当集中自己的才能与心性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因为，这样的追求，“就是人们受教育的目的，更是文化与教育的最高理想”^③。

方东美先生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在现代新儒学的人生哲学中也是较具特色的。在现代新儒学中，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与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论都自成系统，颇具影响。冯友兰在《新原人》一书中，将人视为理性的动物，认为“人是有觉解的东西”，人生意义的差别，决定于人对于人生的不同“觉解”。根据人对人生“觉解”的不同，冯友兰区分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人生境界。冯友兰认为，在四种人生境界中，“天地境界”是

①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7页。

② 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1页。

③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转引自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8页。